

60 年来大陆地区香港史研究回顾

张 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 《60 年代大陆地区香港史研究综述》一文,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总结了大陆学者的香港史研究成果。一方面,综述梳理了 60 年来内地香港史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指出历经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内地的香港史研究从无到有,确立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综述从中英关系视角下的香港、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香港本地史研究三个角度,分专题详述了香港史各重大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全面展现了 60 年来内地香港史研究的学术成就。

[关键词] 香港史;中英关系史

[中图分类号] K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4)09-0015-21 [收稿日期] 2014-06-17

[作者简介] 张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60 年来大陆地区香港史研究概况

(一) 1949 年至 1980 年代的研究状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大陆史学界的香港史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提议研究香港历史,然而,囿于当时的政治及外交环境,香港史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建国后近 30 年时间里,有关的研究少有进展。仅有的研究成果有丁又(杜定友)的《香港初期史话(1841—1907)》^①,此系内地出版的第一本香港史著作,记述了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占领香港的斗争,并零星记载了香港割让后的某些事件以及 19 世纪香港的社会概况。由于条件所限,该书主要运用的是中国史料,对外文资料少有运用。另外,书中的错讹之处不少,比如,关于新界人民反接管的武装斗争,书中不足百字的一段话,竟有错误五、六处之多。^[1]尽管如此,该书作为大陆学者香港史研究著作的开山之作,其历史地位值得肯定。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有关论文亦只有几篇而已,显而易见专注于香港与反帝运动的关系,这也是当时政治、学术生态的一个正常反应。

1978 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80 年代初中英两国政府开始就收回香港开展谈判,宏大历史背景的转换以及服务于中英谈判的现实迫切需要,构成了推动香港史研究的两大刺激因素。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分别建立了余绳武、刘存宽、金应熙等知名学者领导的香港史课题组,逐渐形成南北两个香港史研究中心,在香港史学术研究及配合香港回归的宣传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英国在谈判初期坚称中英间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依然有效,对于香港被割让、强租的屈辱历史予以揭露,并对香港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百余年历程作出客观、公正、翔实的回顾与总结,无疑是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80 年代所推出的研究成果中,最为重大的突破和进展首推关于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的研究,多位资深学者还原了英国侵略者逼签条约的历史真相,论证了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除此之外,所发表的专题论文涉及到汇丰银行、怡和洋行在对华侵略中的作用、香港与孙中山革命思想形成之关系、近代香港的改良思想家、香港海员罢工中的领导权问题以及香港经济史分期,等等。不难看出,学术界

关注到香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这一时期有一些关于香港史的著述出版,多为通俗性读物,如刘蜀永的《香港历史杂谈》,^②该书反映了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作者本人的初步研究心得。姜秉正的《香港问题始末》^③,该书以英国侵占港岛、九龙、强租新界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为主要内容,在学术观点以及史料征引方面“硬伤”较多。其他的著述还有元邦建的《香港史略》^④以及金应熙主编的《香港史话》。^⑤《香港史略》是内地学者编写的第一本通史性香港史中文著作,作者利用所能找到的中文书刊资料叙述了香港从古代到1985年的历史。该书在香港地区曾多次再版,但总体来看,该书对香港历史的叙述缺乏全面性和应有的深度。金应熙的《香港史话》虽为偏通俗性著述,但严肃的学术态度、翔实的资料以及深入的分析,使这部著作在香港史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书中对于某些香港历史事件的分析具有突破性。这一时期在专史方面,则有关于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专著面世。

(二) 香港回归前后的香港史研究热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内地学术界自80年代初起投入的研究力量进入丰产期,与此同时,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日益临近,大陆史学界形成了各方面学术力量短时期内快速汇聚的局面,因此,90年代史学界集中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无论是综合性、专史性著作还是专题论文,都有相当数量的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问世。

综合性学术著作方面,较为重要的是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19世纪的香港》、^⑥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⑦许锡辉等所著的《香港跨世纪的沧桑》、^⑧刘蜀永主编的《简明香港史》。^⑨

《19世纪的香港》是第一部对19世纪香港史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的中文专著,其开创性意义在于征引了大量的中外文档案和书刊,对于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予以细致、周详的披露,同时对于英国占领前的香港地区以及19世纪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均给予系统性的论述。

《20世纪的香港》包括20世纪香港政制、香港与中国内地时局的相互影响以及中英关于香港的交涉等三个部分,无论结构、观点、内容均与以往西方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有所不同。

《香港跨世纪的沧桑》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从远古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期间香港历史的发展概况,并对香港历史的发展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其薄弱之处在于史料征引方面尚显不足。

《简明香港史》一书系《19世纪的香港》和《20世纪的香港》两书作者的沿续、拓展之作,除保留上述两部著作的精华内容之外,补充了香港古代史、港英政府统治手法的变化、香港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之成为一部涵盖香港150年历史的通史性中文著作。

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专史出版,涉及到近现代粤港澳关系、香港英资财团、香港华资财团、香港华商等方面的内容。受到香港史研究热潮的影响,有关于香港文学、报业、电影等方面的专史出版,这些作品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著述,但因为独具各自的专业视角,亦可为香港史的研究提供素材。

专题性论文方面,与综合性、专题性研究专著的推出同步,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呈现出多主题、多视角、全方位解析香港历史的特征。总论方面,有刘蜀永的《香港:150年政治经济发展概况》(Hong Kong: A Survey of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150 Years),^⑩该文发表于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性学术刊物《中国季刊》,反映了中国学者对香港历史的学术观点,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交涉,应该是最具分量的研究成果,除了对三个不平等条约续做深入分析以外,对于百余年来中英就香港问题所展开的重要交涉,学术界均作出了相应之研究,如中英新约谈判中有关新界的交涉、英国重占香港与受降权之争、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尝试、关于九龙城问题的交涉,等等。从香港本地史研究看,这一时期出现了真正立足于香港的本地史研究,所涉及到的课题有香港的人口变迁、香港早期城市发展与华人社会的调适、香港近代工业的发展、早期香港工人阶级状况、香港的社会问题,等等。关于香港与内地政局的互动关系,亦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在资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余绳武的《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译——割占香港岛》、刘蜀永的《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译——割占九龙》、刘存宽的《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译——租借新界》^①、中国第一历史馆编辑的《香港历史问题档案图录》^②以及马金科主编的《早期香港史研究资料选辑》。^③

(三) 近十几年来香港史研究的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香港史研究在内地成为一门显学,研究队伍和发表的研究成果都颇为丰富。香港回归以后,快速兴起热潮呈逐渐退去之势,香港史研究回复常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常规的门类。总的来看,近年来推出的研究成果的数量与之前香港史大热时期不可相提并论,但从质量上看,研究成果的基础较为扎实,颇为符合学术研究之规范。

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专著,综合性通史有刘蜀永主编的《简明香港史(新版)》^④,该书系将1998年之旧作大力修订而成,补充了香港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之成为一部系统、全面叙述香港历史的著作。专史方面则有多部关于香港经济及社会文化的专著推出,内容涉及到香港近代经济史、20世纪的香港经济、香港地产业百年、香港金融业百年、20世纪的香港社会与文化。这一批研究成果的问世,改变了之前香港史研究偏重于政治外交史的局面,使大陆史学界对香港史的研究在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均有较为深入的推进。专题论文方面,近年来的研究方向更为着重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如香港与中国内地不同地区的贸易关系、发生于香港但主要牵涉到中英关系的某些具体事件。

以下将以主题方式分别叙述香港史研究的有关成果。

二、中英关系视角下的香港问题

(一) 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

1. 《南京条约》与割占香港岛

英国蓄谋夺占中国海岛之论证。有关研究指出,英国企图夺占中国沿海岛屿蓄谋已久。随着英国对华贸易的扩大以及鸦片走私的猖獗,1830年即有47名在华英商联合上书英国议会,要求英国政府采取与国家相称的决定,在中国沿海地区取得岛屿一处,以保护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但他们没有确指什么地方。^[2]另有研究指出,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W. Napier)是首倡夺占香港岛之人,此人于1834到达广州后,认为香港可以作为英国侵华的商业和海军据点,遂正式倡议占据珠江口东面的香港。英国借口林则徐禁烟决定发动战争之时,英国外交大臣颁给英国侵华全权代表之《对华条约草案》中即有“中国皇帝陛下将……□□岛屿割让”给英国之预设条约,后来的《南京条约》不过是按照英国侵略者的意志在已定的条约上填填空白而已。^[3]

《川鼻草约》真伪之考证。1841年1月20日,义律(C. Elliot)在澳门发布公告,称他与清政府钦差大臣琦善达成了初步协议,内中规定将“香港岛和港口割给英国”,此即流传甚广之《川鼻草约》之由来,多年来上述说法一直被大量中外文有关著述所采用。80年代以后,有学者详加考证后指出,英国据以占据香港的所谓《川鼻草约》一事,完全是英方的讹作。由于道光皇帝反对割地,所谓《川鼻草约》根本未曾签订,英国殖民主义者是在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情况下,用武力夺占香港岛。^[4]还有的学者指出,所谓“穿鼻草约”,即义律等所谓经琦善“盖印”之“协议”、“文据”,纯属无中生有。经深入研究琦善与义律谈判过程可知,琦善的所作所为,仅限于为英人在香港“泊舟寄居”“代为奏恩”,根本不存在关于割让香港岛的协议。英方捏造这样一个协议,其目的在于以谎言混淆视听,给他们强占香港岛的非法暴行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5]还有的学者揭露了义律的策略,认为其计谋就是先占领,再补约逼签。义律是在占领香港岛以后才先后提出关于所谓的《川鼻草约》的三个方案,催逼琦善盖印,而后由于道光帝获悉香港被英军强占后将琦善锁拿解京,川鼻草约未曾签字盖章。^[6]

英国逼签《南京条约》与割让香港岛。有关研究充分论证了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首先关注到的是贪婪的义律和更加贪婪的英国政府。有学者分析了义律强占香港岛以后英国政府的态度,认为英国外交大臣之

前给义律的训令强调必须占领海岛,但并没有指明强占香港岛。侵占香港岛的决定是义律作出并加以实现的,义律认为香港岛不仅在对华贸易上有重要意义,它还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7]但是,英国方面对义律的成果很不满意,认为这些成果比起英国派遣庞大的远征军来华实在是得不偿失。为此,英国政府罢黜了义律,扩大对华战争。英国外交大臣之前曾指责义律放弃舟山占领香港岛,后来则指示接替义律的璞鼎查不要放弃该岛。^[8]关于《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之条款,有学者指出,该约终于把《对华条约草案》的空白拟割岛名填上了“香港”,这些掠夺性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和非法性,不仅在于英国侵略者早已拟就的条约稿本,纯属单方预谋,而且签字的过程,从始至终,清廷都是在他们的“刺刀尖下”和“大炮的瞄准下”按照他们的命令签字画押的。^[9]还有的学者指出,英国割占香港岛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先武装占领再逼签不平等条约的方式,以血与火的手段实现的。^[10]

2. 中英《北京条约》与割占九龙

有关研究证明了英国以与割占香港岛同样的手段侵夺九龙的事实。有研究指出割占九龙仍是一个蓄谋行为,英国垂涎九龙半岛南端和整个维多利亚港由来已久,英国占领香港后英国商界和军界的某些人即继续鼓吹占领九龙和昂船洲,他们举出了种种理由来论证割占九龙的“必要性”,而英国政府正式作出夺取九龙的决策,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11]有关研究注意到英方在割占九龙行动中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即强占之前,先行“租借”,用这种占领形式作为过渡步骤。^[12]另有学者指出,狡猾的侵略者为了更便于公开占领,先是通过驻广州领事威胁两广总督劳崇光以出租的方式把它移交给英国政府,闪电般地于一天之内办完“永租”手续,接着英国政府再达到要清廷割让这块土地的目标。《北京条约》签订之时,英、法侵略者单方面占领着广州,九龙半岛已“永租”给英国,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城并将圆明园化为焦土,英国侵略者以自己的血腥行为证明了这次割让的掠夺性、非正义性和不平等的性质。^[13]

3.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与强租新界

英方拓展香港边界方案之酝酿。有学者认为,伦敦中国协会及其香港分会,是谋划“拓展香港边界”的主要策划者,1895年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两个有利于加强其在云南、两广地位的条约,其时中国协会便建议英国政府趁机实现扩充香港领土的目标,并先后提出了两个扩界方案,而最终缔结的条约即以第二个扩界方案为基础。^[14]另有学者指出,港英当局亦多次以防务为借口叫嚣扩展香港的领土。^[15]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不平等性质之论证。与之前以两次鸦片战争夺占香港领土相比较,英国夺占新界的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对于英国“租界新界”的历史,有一种说法认为英国租借新界是通过与清政府举行外交谈判“和平地”租得的。在有关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以“专条”的谈判过程以及英方在谈判中施用的种种手段证明了该约的不平等性质,澄清了某些模糊不清的说法。有学者指出,1898年法国向清政府要求租借广州湾,英国借机向清政府提出了香港扩界的要求,清政府不能拒绝,便力求把拓展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16]但英国胃口甚大,李鸿章迫于压力,于1898年5月19日同意了英国驻华公使一手把持拟就的专条文本。孰料英方第二天就要求推翻成议,重新谈判,按照英国殖民地防务委员会所提出的方案进行,并最终按照英方新的要求达成协议,租借范围较前大为扩大。^[17]

关于《专条》的不平等性质,有学者指出,该约是英国使用威胁和强制手段的产物,其谈判始终是以英方提出的侵略方案为基础的,起草由英方一手包办,谈判是不平等的,英方对其侵略要求寸步不让,达成协议后想改就改,任意宰割。凭借本国实力对他国进行威胁,利用他国国内外困境趁火打劫,对他国施加政治、外交压力,在谈判中以本国的意志强加于他国,均属于强制行为,这些强制行为,在1898年的中英租借新界谈判中,英国可以说全都采用了,更何况在租借新界的过程中,英国亦并非没有使用武力,如对新界人民反接管的武装斗争实施军事镇压,等等。^[18]

关于《专条》签订后英国进一步扩大侵略的行为,有关研究澄清了既往某些错误的成说。以往许多有关

香港史的著作,都认为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确定了以深圳河为租借地北部陆界,比如丁又的《香港初期史话》、元邦建的《香港史略》都采用了此一说法,倒是英国香港史专家安德葛在其《香港史》一书的描述更为合乎事实,^[19]惟所述过略。目前学术界经对新界北部陆界的勘定过程深入研究,匡正了某些流布甚广的错误说法。有关研究首先注意到骆克报告书的内容,指出,骆克报告书为英国政府提供了许多新的侵略设想,建议修改北界,提出北界应以自然地貌、大山河流划分,并野心勃勃地建议租借整个新安县。^[20]还有的学者明确指出,骆克在其报告书中根本无视《专条》及双方已经达成的谅解,提出了一系列得陇望蜀的建议,可以将骆克报告书称为“撕毁条约”报告书。^[21]关于北界的最终划定,有关学者的研究证明,新界北部陆界以深圳河为界,并非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黏附地图》所规定,而是英国通过1899年的定界谈判违约侵越,经该年3月19日的《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而确定。^[22]关于本次中英双方谈判,有研究指出,在划界谈判中,中国方面虽然挫败了英国想划界夺取深圳及沙头角的企图,但又失去了包括深圳河在内的部分领土。^[23]

(二) 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尝试

1. 1942—1943年关于香港新界的中英交涉

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较为深入、扎实。通过大量运用中英文档案,此次中英交涉的有关内幕得到了较为深彻的披露与剖析。

关于中英双方各自抱持的谈判方针,研究认为,国民政府是要求“一刀切”,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九龙租借地(即新界),而英国的既定方针是不把香港归还中国,为长期占领香港,九龙新界也不能交还中国。^[24]关于当时对英方意图的判断,时任驻英大使的顾维钧曾在其回忆录中载有丘吉尔同意战后归还香港的说法,对此一关系到中英谈判结局的重要问题,有学者披露了英方战时研究、设计香港未来的种种设想,并据此提出,顾维钧回忆录中有关英国归还香港意愿的失之乐观的结论,似乎只是英方内部的一种看法而已,并非英国政府的决策。^[25]证之于英国后来在谈判中的表现,这个结论应该是正确的。

关于中英双方在谈判中的较量,有关研究充分论证了英国恃强欺弱的态度以及狡黠之策略。研究指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英国坚持顽固立场,软硬兼施,既拒绝讨论九龙租借地问题,又虚伪许诺战后讨论九龙租借地问题,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约。宋子文、吴国桢针对英国拒绝讨论九龙租借地问题的蛮横举措都曾经寸步不让,坚决反击,英方为了打破僵局,转而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一方面威胁说如果中国坚持要收回九龙租借地,英国将不再与中国签订新约,另一方面则向顾维钧许诺战后一定归还,由顾维钧去游说宋子文和蒋介石。^[26]另有学者指出,英国政府坚持强硬路线,不愿明确允许归还新界,最初只是同意战后同中国“讨论”新界的“租期”问题,后迫于外部压力,才同意删去“租期”二字,并同时表示作此“让步”后决不再让,否则就拒绝签订新约,在英国的强势压力之下,蒋介石终于被迫退让。^[27]

关于谈判的最终结果,有关研究一致认为是完全的失败,有学者指出,中方本来还寄望于通过一项照会声明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但英方没有通过这次换文承担任何义务,作出任何承诺,可以说,中方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的谈判是完全失败的。^[28]

关于中方主要决策及谈判人员在本次交涉中的态度,有关研究认为,蒋介石似乎是坚持将新界问题纳入中英新约的最后一人。^[29]有学者指出,宋子文在谈判的前一阶段坚持不解决九龙租借地问题绝不签约的立场,后来则决心动摇。顾维钧对蒋介石的游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顾认为要在条约和九龙租借地之间进行取舍,并对英国的政策做出了估计。但这个估计是错误的,英国的真实态度是拒绝讨论九龙租借地问题,战后也不会把香港、九龙归还中国。^[30]

对于中国在此次谈判中未能达成收回新界的目标,有学者认为,国民政府一方面由于本身的软弱,另一方面又对英国抱有幻想,所以在英国的软硬兼施之下,被迫放弃了收回九龙的要求。^[31]还有的学者尖锐指

出,国民党政府对此不能辞其咎。宋子文等以保持盟国“团结”为理由,劝说蒋介石让步,其实是在英国压力下委曲求全,是一种软弱心理的表现,观乎世界潮流,即使新约暂时不签,英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又岂能长期保持其在华特权?^[32]这样的结论深刻触及了国民政府对外交涉的本质。

2. 战后香港归属及受降权之争

与1942—1943年中英收回新界交涉有密切关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战后香港的归属之争。有关研究依据解密的英国外交档案,充分揭示出从中英新约签订到英国重占香港之间英方的政策取向以及最终实现其既定目标的曲折过程。有关研究均论证了英国决意在战后夺回香港的既定方针。有学者指出,从1943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政府,尤其是内阁的主要决策人丘吉尔、艾登、艾德礼、贝文等人,均一致主张战后重新占领香港,他们始终就香港战后的地位问题进行着谋划。^[33]还有的学者指出,承继中英新约谈判中的顽固立场,英国在新约签订后即表明不会把香港归还中国的决心,有关事实和言论充分暴露出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的本性并没有什么改变,英国政府经过对香港未来的几种方案进行比较,排除了联合国共管、中英共管等方案,决意必须用英国武装力量独立收复香港。^[34]还有的研究者认为,英国拒绝在1943年的中英条约中交还九龙租借地,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战后重占香港,并指出,从英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可以看出,英国决心重占香港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后香港的地位更加重要了。^[35]

英国政府在香港未来地位上的种种图谋,直接导致了日本投降后的中英香港受降权之争。有关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受降安排问题上与英国所发生之争执,其二是美国在此项争执中的重要作用。一般研究均注意到在受降安排上国民政府为实现自身正当权利而做出的努力,但不同的研究者的最终评价有明显之歧异。持积极肯定态度者认为,中国方面在这次争端中进行了一些妥协,但这种妥协并非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味退让,结果丧失了一个收复香港的大好时机,留下了历史的遗憾。事实上,当时中国方面所做出的妥协,是一种有条件的、有限的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被称之为强硬的妥协。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强硬妥协的结果,才致使最终解决方案的产生,哈考特以双重身份在受降书上签字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在香港地区的主权,而且这一外交文件本身也成了中国在香港拥有主权的重要依据。^[36]而某些较为温和、偏于中性的观点则认为,国民政府的决策者仍然存在着半殖民地心理,缺乏自立自强的意识,常常知难而退,加之缺乏盟国的支持,以至把理直气壮的事情做得低声下气。^[37]还有一种观点则是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持较为激烈的批评态度,有关研究尖锐地指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民族解放潮流空前高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声浪响彻全球之时,国民政府为何容忍英国重新占领香港,甚至连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正当权利也让与英国,这种不合理、甚至荒诞的现象何以竟成为事实。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则对国民政府的表现评价甚低,认为,由于国民政府的软弱,中英之间关于香港所争持者仅为受降权而已,英国为了排斥中国,抢夺对香港日军的受降权,采取了先与美国达成谅解,再压迫蒋介石就范的策略。英国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美国态度的转变固然是酿成如此结局的原因,然而,国民政府缺乏自强自立的精神以及坚持“反共为先”的政策,才是导致英国在香港得逞的根本原因。^[38]其他学者亦有类似的评论,认为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把主要精力放在战后的内战上去,特别是1944年底至1945年初,在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无所大伤,国际威望一落千丈,因此对外不再高唱收复香港的调子,也不再提重新讨论九龙问题,其目的是换取英美支持,进行内战。^[39]

许多学者注意到美国在中英受降权争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均认为英国重占香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有学者指出,在受降权争执中,中国和英国都在请求美国的支持,而最终美国在英国的压力之下,不惜修改“一号命令”,同意在受降问题上明确把香港划出中国战区,美国拒绝支持中国,令国民政府处于孤立无助的地位,美国的做法既表现了美英传统的“血浓于水”的特殊关系,也表现了美国对中国的轻慢。^[40]还有的学

者深刻揭示了罗斯福总统时期美国对香港政策的两面性,认为美国一方面不断向中国官员或在公开场合下继续表示希望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另一方面又在暗中对英国政府承诺,不会要求改变英国对香港的统治地位。这正是中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不断记载罗斯福及赫尔等人要求英国归还香港,而英国方面的档案和材料却不断记载美国许诺不改变香港现状的真实背景。有此前因,在中英双方因受降权发生严重对峙之时,美国以杜鲁门为首的决策者采取了偏袒英国的立场。从美国对香港政策的角度看,英国重新占领香港,标志着美国的香港政策由罗斯福时期的在口头上和道义上支持香港回归中国,演变成维护至关重要的美英联盟转而支持英国重建在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41]

另有研究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取向上来评价美国态度转变引致国民政府的对英退让,认为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始终唯美国马首是瞻,太平洋战争期间就一直企图依靠美国来解决香港问题。美国最初支持中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国民政府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便比较坚决,后来美国态度转变,它就连忙向英国让步,只图替自己找到一个台阶下便了结争端。国民政府把自己国家的命运主要寄托在别国的支持和帮助上,这个教训值得引以为戒。^[42]

关于英国重新占领香港后中英双方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打算,有学者指出,1946年蒋介石和顾维钧都曾经向英方表示过希望双方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而英国则采取了一种“拖延”的态度,英国外交部和殖民地部的备忘录清楚地反映了英国政府企图长期占领香港或以归还香港主权为名,而保留英国在港利益不受影响的真实用意。全面内战爆发后,香港问题再也没有被国民党政府提起过。^[43]

(三) 1949年前后的香港

国共两党决战结局的渐趋明朗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对香港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新中国的出现令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中国政府,这使得英国当局对中国收复香港地区的担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学术界对此的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此一历史转折期间,中英双方对于香港未来的定位及政策,以及如何最终在“维持现状”这一点上达致平衡的过程。

关于英国政府的政策,有关研究追踪了英方政策的不断调整。有学者指出,1948年底,英方对于香港前途存在着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中国新政府有可能维持香港现状不变,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会使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收复香港,其时英国内阁的基本政策取向是赞同外交大臣贝文(E. Bevin)所提出的在中国“保留立足点”。^[44]1949年震动世界的“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对香港地位深为不安,有关研究均关注到英国内阁的决策讨论,有学者认为,当时英国内阁对于中共对香港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英国应作出的反应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共诉诸武力索回香港的可能性不大,英国应通过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大陆的良好关系,而不是扩大武装力量来保住香港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虽然中共用武力收回香港的可能性不大,但却不能完全排除。因此,英国政策的首要目标应是阻止共产党军队进攻香港,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紧调兵遣将,做好反击的准备。英国内阁最终批准了为抵抗中共大规模进攻加强香港防备力量的方案,并采取了相应的增兵行动。^[45]

另有学者持有不同看法,认为“紫石英”号事件发生以后直至1949年4月28日的内阁会议,大臣还是比较一致地认为解放军不会立即进攻香港,此后并没有发生特别的事件,足以使他们做出新的判断。英国向香港派遣援军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英国在香港及东南亚的统治地位严重的不稳定感,以及对香港及东南亚华人严重的不信任感。他们派遣援军藉以“阻吓”的,主要还是香港及东南亚的华人。^[46]

关于维持香港现状局面的最终达成,有关研究指出了英方行为的两面性,即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向香港派遣援军并加强香港社会内部控制,摆出绝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同时暗地里则准备后路,考虑与中共谈判甚至国际共管的可能性。与英方的惊慌失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的沉着稳重的态度。对于香港的地位,中国政府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决定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由于英国政府最终采取

了有别于美国的务实对华政策,决定在中国“留步观望”,并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对香港实施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遂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47]

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剧变年代中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是学术界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有关研究注意到美国 and 英国围绕着防卫香港和承认中共政权而发生的既谋求合作又相互牵制的复杂关系。有学者指出,英国政府在“保卫香港”的过程中,曾寻求美国的支援,而美国最高决策集团迟迟不愿作出明确的决定,除军方和国务院存在着意见分歧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把香港防卫问题作为一张阻止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王牌。而英国政府在全面考虑到英国在华利益和香港问题后,最终还是决定不顾美国的威胁,利用与中共政权建立正常交往的办法来保住香港。其后美国政府正式决定不支持英国在军事上防守香港。这一方面是军方认为帮助英国防卫香港代价太高,另一方面又表示美国政府对英国承认新中国的决定的一种报复和惩罚。^[48]

美国介入英国对港政策和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两航事件。有关研究梳理了两航资产归属所引发的中、英、美之间的复杂交涉,认为,由于美国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致使事态急转直下,英国政府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决定置中国政府所应享有的管辖权于不顾,修改香港现行法律以迎合美国的利益。英国在两航事件中偏袒美国的做法,影响到中英建交谈判和顺利进行,也影响到香港与中国内地的正常交往。^[49]

(四) 九龙海关与 1948 年香港《关务协定》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九龙设关与中国政府查堵香港走私的努力。关于九龙海关的设立,有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有学者关注中英围绕九龙中国税关争议的历史,揭露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的悲惨处境。1858年鸦片进口“合法化”以来,港英当局纵容港商走私,使中国财政遭受了重大损失,迫使清政府在香港附近设立税关,对此,港英当局及香港商界竭力反对,大叫特叫中国“封锁香港”。经过长期协商和争论,双方于1886年签订《香港鸦片贸易协定》,对鸦片走私作出限制性规定,但港英当局继续纵容走私。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时,英国曾向清政府作出保护中国税收之保证,之后又背信弃义,悍然将中国设在九龙新界的税关悉行驱逐,从而为走私大开方便之门。^[50]另有学者以九龙海关设立与赫德的关系为研究视角,认为九龙海关的设立有两面性,既有使海关势力扩大,使西方列强首先是英国对清政府的控制有所增强的一面,也有使清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一面,认为对清政府急于利用九龙海关税收的目的不应否定,但从另一面看,九龙海关的设立使常关的部分权力丧失,甚至出现了几乎丧失澳门主权的情况,又确实是十分有害的。^[51]

香港走私活动的猖獗,构成了1940年代后期香港关务协定谈判的深远历史原因。有学者指出,香港开埠后猖獗的对华走私活动是一个贯穿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难以解决的痼疾,中国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历届中国政府均采取各种努力,查堵香港的走私,并就此与港英政府展开交涉,但种种努力始终收效甚微。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利用抗战期间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二战后英国急于扩大对华贸易的心理,于1946年底再次就杜绝走私问题与英方展开交涉。^[52]

关于中英双方在交涉中各自的立场,研究指出,英国殖民地部与外交部的政策取向有所差异,殖民地部的交涉策略,系以复原转口条例为条件。^[53]而外交部原本就不主张向中国提出附加条件,以免激怒国民政府,从而使问题复杂化,最后殖民地部作出让步,放弃了原来的立场。^[54]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了中方在本次谈判中坚持不予退让的立场,中方认为,复原战前转口条例涉及沿海贸易权,中国政府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还有的学者认为,战后国民政府对英外交的最大成果即是香港关务协定的达成,这是一个在字面上几乎是中国单方面受益的协定。面对英方的拖延战术,谈判当局最终历时两年“耗”出了结果。^[55]

对于协定的评价,有关研究既肯定了协定本身的积极意义,亦指出了其实施中的困境。有学者认为,协定就香港政府协助中国海关在港采取措施制止走私做出了一些较为行之有效的规定,对中国海关杜绝香港

的走私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关务协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56]不过,近年来有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考察的视角,梳理了关务协定实施的复杂处境,认为由于中方坚持强硬立场,最终获得了在香港境内征收关税和巡逻缉私的权力。然而,协定的实施却招致了粤港工商界的共同抵制,原因在于当局严苛的进出口管制与民争利,祸及民生。^[57]

(五) 有关九龙城寨问题的交涉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充分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处心积虑强行占领九龙城的历史事实,二是梳理历次有关九龙城的中英交涉。有关研究以大量的证据披露了英方为长久霸占九龙城而施用的种种计谋,以及中方在交涉中的坚持与无奈,无论是孱弱的清政府还是跻身“四强”之一的国民政府概莫能外。

关于中英九龙城悬案之由来,有学者指出了英方预设的陷阱,在中英谈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时,李鸿章迫于压力,对于对方所提出之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不敢多加争辩,惟坚决反对租借九龙城,理由是该地设有中国衙门。当时的英方谈判代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 MacDonald)注意到了清朝官员对九龙城的重视,为尽快实现拓界目标,遂向英政府提议对此点不作坚持。因此,1898年签订之《专条》明文规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但英方为了给日后非法占领九龙城留下借口,在《专条》中塞入了“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这样一句话,埋下了未来侵越条约的伏笔。^[58]关于窦纳乐同意暂时保留之原因,有学者指出,当时清朝大臣对突然明显改变现状对广东舆论的影响深感忧虑,认为九龙城的管辖权如果转为香港政府,后者势必要颁布一些法例,当地居民目前不会服从。而窦纳乐则认为,总理衙门预料到会引起麻烦,可能是对的,所以他向英国政府建议为了英国总体在华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59]

关于英方图占九龙城及其后的交涉,有学者指出,《专条》签订后,英商和英军中的一些有影响的社团大为不满,纷纷要求取消中国对九龙城的管辖权。港英当局支持他们的主张,并为取消中国的管辖权出谋划策。^[60]英商、英军和港英政府的有关鼓噪明显违背《专条》之规定,却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1899年4月,英方终于以当地中国居民反抗武力接管的斗争为借口,强行占领了深圳和九龙城。清政府随即向英方提出抗议,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国的抗议,英国不但不理会,反而将英国占领九龙城和深圳的责任归于中国。当时英国外交部对于占领九龙城和深圳两地的态度有所不同,对于前者,英国政府认为不能容许中国在九龙城恢复权力,对于后者,则认为行事过于仓猝,可以考虑撤出。其后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为夺回九龙城治权奔波交涉两年无果。^[61]随着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清政府无暇顾及九龙城问题,有关交涉被搁置。

对于清政府在九龙城问题交涉中的表现,有的学者持较为肯定的态度,认为从清代有关九龙城问题交涉过程考察,不能把清政府坚持中国拥有对九龙城的管辖权仅仅归结为“维护面子”问题,而是表明总理衙门的官员已懂得利用条约、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企图多保留一些主权,虽然在国力孱弱的背景下,这种尝试当时很难取得成效,但却为以后历届中国政府的有关交涉奠定了较好的基础。^[62]

20世纪30年代中英关于九龙城问题的交涉进一步凸显了英方为达到无理占据九龙城所施用的种种计谋以及国家命运多舛年代里中方交涉的无力与无奈。有关研究指出,此次始于1933年历时4年的交涉因港英当局随意处置城内土地而起,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英国方面起初曾编造多种理由,企图证明英国政府对九龙城行使管辖权是有理有据的,后来则采取了避免就管辖权问题同中国政府正面交锋,实际上继续我行我素的现实策略。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广州的沦陷,交涉不了了之。^[63]

对于40年代末中英之间的九龙城问题交涉,有关研究集中于起因、解决方案的讨论以及最终再度不了了之等几个方面。关于交涉之再起,有学者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本想趁有利的国际形势恢复行使对九龙城的管辖权,但港英当局又抢先行动,在城内强行拆迁。对于港府此举,研究认为,此绝非单纯的行政措

施,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即通过强拆显示港府对九龙城的管辖权。^[64]近年则有进一步的研究指出,港督葛量洪采取行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出了国民政府不会作出强烈反应的判断,然而,事实上港府的强拆行动引发了中英之间的严重交涉以及战后中国最大规模的反英浪潮。^[65]

关于本次交涉中有关各方的态度和立场,有学者指出,中英双方就管辖权问题展开了公开的辩论,中方坚持中国政府仍享有在九龙城之管辖权,对于英方过去及将来违反《专条》的一切措施断难认为合法。英方则声称,除日占时期以外,香港政府已在九龙城从未间断行使完整之治理权近50年。由于中英双方都不想使事态扩大影响两国关系,双方在公开辩论的同时密商了将九龙城改为公园的解决方案,中方还提出了将两广特派员公署驻港办事处设在公园内以解决管辖权问题的主张。^[66]关于清拆之议的提出,有学者认为,九龙城寨事件发生后,激起国内民众的极大反响,英方在中国人民的抗议声中开始退缩,提议在城寨清拆原址修建公园,而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原则上同意英方的建议,但又提出需将两广特派员公署设于园内,这意味着中国的官方机构将正式进驻九龙,从而改变自1899年以后中国官员被赶出城寨的现状,其意义非同小可。^[67]关于这个解决办法的最后无果而终,有关研究注意到英方的拖延战术以及港督葛量洪的作用。本来英国外交当局对前述解决方案态度中性,可是葛量洪态度十分强硬地反对这个提议,他主张英方应当强硬起来,由“歉疚式防御转向进攻”。^[68]后来虽然中方在解决方案上一让再让,英方则以静制动,用尽手段迫使中方不断从底线后退,以拖延战术应付,本次交涉再次不了了之。

近年来有学者对本次交涉提出了某些更为深入的研究结论,比如,对于交涉后期中英双方被动主动关系的转换,指出了国民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认为,九龙城事件发生之初,国民政府注意到可以将民众运动作为向英国施压的砝码,也确实试图将民众运动纳入可操纵的范围。但广州群众运动失控造成沙面事件,致使国民政府在接下来的交涉中陷于被动。而英国方面感觉到国民政府害怕激起国内民意而急于解决问题,遂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转而占居了主动。关于本次交涉的评价,则认为,中英此次交涉是50年间历届中国政府在城寨问题交涉上走得最远的一次。然而,战后中国只是“五强”中的弱国,老牌殖民帝国英国仍挟其余威,以强制外交相对待,在殖民地问题上,英国对不同殖民地操持不同的态度,其在九龙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恰恰是这种政策的体现。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局的显著变化显然是交涉无果的直接原因。^[69]

(六) 1982—1984年中英关于收回香港的谈判

从外交史的角度对此问题所做的研究目前并不多见,相关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以及谈判中双方的较量。关于中英双方在谈判中的各自立场,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对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了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70]有关研究指出了英国方面的策略准备,认为,英国外交部最初的看法是,占香港总面积92%的“新界”应如期归还,但余下的九龙和香港岛难以独立存在,最理想的结局是“以主权换治权”。但1982年7月的决策会议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反对上述主张,认为依据英国所理解的国际法,19世纪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都是有效的,应当继续遵守。中国如欲收回整个香港,就必须与英国达成协议,修改那两个割让条约的相关条款。^[71]

关于谈判过程中英方态度的被迫转变,研究指出,邓小平坚持主权问题不能谈判,1997年中国要收回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面对中方毫不动摇的立场和谈判停滞的局面,英方不得不从之前的立场后退,提出了“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对于英方此举,中方则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指出“主权属中、治权属英”论的真正目的是用新的不平等条约代替旧的不平等条约。^[72]英方在香港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僵持一年多以后,最终不得不放弃幻想,调整策略,作出了顺应时势的选择,表示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中英共管,并表示理解中国方案的前提与基础是1997年以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应该归还中国。有关研究同时指出了英方在后续谈判中力求保持其在香港的传统利益与特殊地位的种种做法。^[73]

(七) 其他

分析香港历史所折射出的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将香港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机结合的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90年代初的相关研究既指出了香港在英国对华侵略中的作用,亦注意到香港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相对于封建制度的先进性及其影响。^[74]这种以两点论分析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是一个突破。

三、香港与内地的关系

(一) 专史

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的《近代粤港澳关系史》^⑤对1840—1949年间广东与港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填补了港澳历史和广东地方史研究的空白。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的《粤港关系史(1840—1984)》^⑥叙述了从鸦片战争爆发至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百余年间,粤港两地的冲突、合作与交流,该书在阐述1949年以后的粤港关系时,较多地引用了广东省档案馆的历史档案,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二) 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关注到香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有关的研究多方面揭示了香港与孙中山革命思想、革命生涯的密切关系以及香港在辛亥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有关研究均认为,香港乃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源之地,有学者指出,1883—1892年间孙中山在港求学,其革命思想即发源于此时。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的结局令孙中山大为震惊,而当时香港华人为抗议法国侵略所表现出的反侵略和反压迫精神又使孙中山大受鼓舞,孙中山正是从中法战争的刺激和华人反抗侵略和压迫的壮举的鼓舞中,开始萌发了反清革命的思想。^[75]另有学者指出,由于香港采取了比较开放的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同时英国通过对中国内地的侵略积累了财富,香港当时的发展和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相比的进步性,对中国近代史上仁人志士的思想触动很大,使他们立志学习西方,改造中国,这种客观的历史作用在孙中山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76]

关于香港兴中会、同盟会,有学者指出,之所以选择香港作为开拓革命事业的基地,是因为孙中山一直主张武装革命应采取由南而北的战略,他认为“港澳密迩”,便于接济。由南而北战略的确立,必须以香港作为革命党对内活动之策源地。另外,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国内无法立足,而香港的特殊条件,则使其成为革命策源地和大本营成为可能。^[77]关于香港兴中会的创立,研究认为,当时香港已经有辅仁文社等两个爱国政治小团体,因此香港兴中会紧随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而成立,香港兴中会的成立使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由谈论革命阶段进入到实际行动阶段,革命党人以香港为基地发动了多次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如乙未广州之役、庚子惠州之役、洪全福广州之役。香港同盟会直接策划的起义则有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两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防城之役和1908年的钦州马笃山之役则是由香港同盟会承担军用品的供应工作。^[78]

关于香港与革命经费的筹集与转汇,研究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世界各地华侨捐助的革命经费,大多数汇寄香港,在香港集中后统一分发使用。^[79]关于香港华人的捐献,以往研究同盟会财政来源的史家一直低估了来自于香港的捐款,80年代以后的研究挖掘了有关史料,认为香港华人对辛亥革命的财政支援相当之大。^[80]还有的研究着重考察了辛亥革命爆发后香港商人对广东军政府的经济支援。^[81]

(三) 香港与反帝运动

1. 专史

章洪的《香港海员大罢工》^⑦对罢工的历史背景、经过和意义进行了简略的系统论述,惟受到资料的局限,研究的深度及广度明显欠缺。蔡洛、卢权的《省港大罢工》^⑧主要依据中文书刊和调查访问资料,对省港大罢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初步研究,涉及罢工的背景、惨案经过、罢工组织、策略和影响、罢工过程中的中英

谈判、中山舰事件对罢工的影响、北伐战争与省港罢工、国内外对罢工的支援等问题。其不足之处在于所运用的英文档案资料极少,影响了研究的深度。

2. 香港海员大罢工

20 世纪 60 年代有学者对海员大罢工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但受到资料的限制,研究的深度及准确性方面有所欠缺。比如,关于港英政府对罢工的反应及应对之策,研究认为,港英当局在罢工的第一阶段对付罢工的主要手段是高压,其后不得不同意谈判。一方面,英国驻粤领事与陈炯明互相勾结,陈炯明为了取得英国对自己背叛孙中山的更大帮助,出面要求海员与港英当局谈判。另一方面,港英当局最终屈服,谈判达成协议,工人取得了胜利。^[82]实际上以上两个方面的描述不无相悖之处。

80 年代以后,得益于第一手英方资料的利用和思想观念的突破,相关研究有了明显的推进,主要体现在对于英方的政策有了比较确切的阐释以及关于罢工领导权的讨论。关于英方的反应,有学者指出,罢工爆发后香港政府极为惊恐,主要原因是他们相信广州政府和国民党卷入了这场运动。综观香港政府在整个罢工期间的表现,可以看到港府始终把政治上的考虑放在第一位。对于如何对付罢工,港督和英国驻粤总领事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港督认为,罢工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运动,香港政府不能手软,并指出驻粤总领事在罢工初期对广州政府的态度过于软弱。然而,从海员罢工的结果来看,香港政府采取的强硬立场未能奏效,相反自己却因此陷入孤立与绝望的境地,面对罢工给香港带来的沉重打击,香港政府最终被迫作出让步,接受了罢工工人所提出之要求。^[83]

关于海员大罢工与国共两党的关系,60 年代所发表的研究成果认为,海员罢工爆发时,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赞助罢工的,但到了罢工的第二阶段,其态度有所变化,声明孙中山的政府并不对罢工负有责任,又主张罢工海员从速与英方谈判,接受调停,适可而止。^[84]80 年代,有多位学者就究竟谁是海员罢工的领导者这一问题展开激辩。有的学者认为,罢工斗争是在海员工人自己的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自始至终对罢工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85]有的学者则明确提出罢工是由国民党领导的。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也不可能参与发动和领导海员大罢工,罢工期间香港海员当中没有共产党员,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对罢工进行直接的领导。这种局面的形成,可以从国共两党与香港海员的渊源来解释,即 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流亡海外以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即在香港海员中有较为深厚的工作基础,海员大罢工期间国民党则掌握了罢工的领导权。^[86]另有赞同上述观点的学者指出,国民党上层人物在支持和领导海员罢工的时候,无不首先顾及本阶级、本政党乃至本集团的私利,无不有意掩盖罢工本身所体现的反对外国殖民者剥削压迫的光彩。由此出现了孙中山对香港报刊指控他“唆使”罢工的辩白、广东政府宣布与罢工“无关”的声明、陈炯明“调停”罢工的表演等一系列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87]不过,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这个论点完全没有依据,认为罢工是在当时国内外革命潮流的影响和鼓舞下,由苏兆征、林伟民为骨干的香港海员工会自己发动和领导的。罢工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的热烈声援,也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要支持,特别是在经济方面。^[88]

关于共产党在海员大罢工的作用,研究者的观点比较一致,均认为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发动和领导这次罢工,但却给予罢工以极大的支援。有的学者还深入探究了中共广东党组织未能掌握罢工领导权的原因,认为当时中共刚刚成立并从事工人运动,其时共产党人都以充当“后援”为己任,尚未意识到应当与国民党人争当海员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另外,广东党组织在陈公博的影响下一度袒护陈炯明,反对孙中山,致使党在海员工人中的声誉受到损害。^[89]

80 年代以前关于海员罢工的研究,着眼点集中于职工运动和反帝运动,明显表现出对香港社会的疏离感。之后的研究则关注到海员大罢工以后粤港关系的变化,这是将反帝运动与香港本地历史研究有机结合

的一个良好的切入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了两个主题:

第一是香港政府对孙中山态度的变化。有学者指出,海员大罢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香港对内地特别是广东的严重依赖,香港华人与港英当局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广州政府对香港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如何处理与广州政府的关系,成为海员罢工后港英政府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其最初的表现是更加敌视和对立,曾吁请英国政府联合列强干预广州政府,也曾寄希望于陈炯明的军事叛变,先后三次向英国政府提出对陈炯明实施财政援助计划,但这些建议都遭到英国外交部的否定。1923年广东政局发生新变化,孙中山第三次到广州建立政权前后,由于孙中山作出尝试,努力与香港政府改善关系,香港政府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州政府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此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出于维护香港利益的考虑。^[90]

第二是香港与关余事件。有关研究揭示了孙中山、广州军政府、港英当局、英国政府围绕关余问题的复杂关系,指出,1923年9月,广州军政府重新提出收回关余的问题,孙中山为此希望香港政府发挥作用,利用香港政府居中斡旋。在关余事件中,香港政府不愿此一事件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与广州政府的良好关系,遂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其种种行动表明,随着海员罢工事件对香港的打击,香港政府感到一味地采取敌视和反对的做法并不能扼杀国民革命运动,相反,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却因此而蒙受巨大的损失。但是,香港政府的努力因有悖于英国对华政策而受挫。海员罢工后香港企图摆脱英国总体对华政策,维护地方局部利益的尝试就此失败。^[91]

3. 省港大罢工

学术界在80年代以前的有关研究多以邓中夏所著之《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以及大罢工时期的某些报刊为主要依据,对省港大罢工的起因及历史作用较为重视,认为此次工人阶级掀起的大规模反帝爱国政治运动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对大革命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92]8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运用多种中英文档案,对于省港大罢工过程中有关各方的种种策略,予以了较为清晰、透彻的披露与分析,极大地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

省港大罢工是港英当局统治香港以来所面临的一次最严峻的危机,关于英国方面的各种对策,之前的研究多在英帝国主义的名目下笼统叙述,新的研究成果则依据英方的外交文件,区分了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的不同考量和对策。关于港英政府的反应,有学者指出,由于港督司徒拔向来主张香港政府主动出击,采取积极干预的政策,罢工爆发后,港英政府积极与各种敌视广州革命政府的反动势力相勾结,密谋推翻广州政权,为此曾先后与唐继尧、陈炯明和吴佩孚等势力接触,策划推翻广州政府,与此同时,也对广州政府内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寄予希望。^[93]关于英国政府的考虑,研究认为,英国外交部首先排除了直接武力干涉的可能性,对于支持广州的敌对势力,大多数外交部官员持否定态度,因此,英国政府处理省港大罢工问题的立场是,英国在香港的局部利益应服从于英国在华的整体利益,英国外交部反对香港商界和港英政府所提出的要求采取行动的种种主张和建议。^[94]另有学者指出,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要谋划人都力主实行软化分化革命的政策,因此英国外交部倾向于采取软化分化、待机观变的方针。^[95]

关于省港大罢工的结束,史学界的成说是取得胜利后的自动收束,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及罢工封锁斗争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动向,罢工委员会认为罢工封锁斗争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没有必要再继续坚持原有的封锁方式,于是作出了自动取消封锁香港、结束罢工的决定。^[96]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称,经深入查考中英交涉的各种事实,可以认为上述观点只看到了历史的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英国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内情,并不象我国以往一些论著以为的那样无知和懵懂,它对所谓“温和派”和“激进派”的斗争,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政治态度大体了解,常谋利用。它对省港罢工和排货运动的因应,也不是一味简单地实行“炮舰政策”或武装干涉。总的来说,它在这段时期实行的是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实际上,省港大罢工的收束是国民政府在英方诱迫下的软弱让步,是对罢工工人和沙基

惨案遇难者利益的巨大牺牲,充分暴露了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97]有些其他学者的看法与上述观点颇为相合,认为中英第一次交涉结束省港罢工之时,港英当局最初主动提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罢工,后来在谈判中坚不让步,表现出毫无诚意,前后态度判若两人,其深层原因,即在于英方注意到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扩张,广东的政治形势由此发生了不利于革命的变化。^[98]

关于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权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80年代以前对国民党在省港罢工中的活动及作用很少提及,有的文章有所涉及,也仅限于廖仲恺的个人作用。80年代以后有学者提出,国民党是省港罢工的发动者。省港大罢工是在国共合作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举行的,整个国民革命都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开展的,省港罢工也不例外。国民党对罢工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也是确认的。与此同时,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又是省港罢工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省港大罢工是国共两党以国民党名义共同领导的反帝政治运动。^[99]

关于香港华商在省港大罢工中的表现,有研究认为,罢工初期的剧烈矛盾冲突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各方考虑和争取对己有利的结局,香港华商从其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竭力居间调停,发动和平运动,在客观上与广州革命阵营结成了统一战线,对推动顽劣的港英当局走向谈判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0]

(四) 抗日战争时期的香港与中国内地

有关研究经搜集、整理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香港借助于其特殊地位,对中国抗战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其一,香港在转运中国抗战物资方面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广州沦陷以前,香港中国与欧美各国贸易,尤其是军火贸易的重要中心,由于广九铁路与粤汉铁路及时接轨及香港至广州新公路开通等便利条件,有大批抗战物资经由香港通道运往中国内地。广州沦陷以后,粤港间的走私贸易从未中断,仍有相当数量的军用物资运往内地。^[101]相关研究还关注到英国政府对于香港通道的态度,认为英国出于整体对华政策的考虑,在广州沦陷前对中国经香港的物资转运采取了较为积极的配合态度,而在广州沦陷后,英方的政策则发生了倒退。^[102]

其二,香港贸易线对打破日本对华经济封锁的重要作用。有研究指出,抗战前期,传统的以地域性为主的粤港贸易线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直到香港沦陷前夕,它发挥了中国战时对外贸易主渠道的特殊作用。^[103]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抗战前期香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发现,有学者指出,广州沦陷后,香港的地位有所削弱,但仍广泛地拓展了与珠江口东西两翼的扇状贸易运输网络,开辟了通过越南与中国内地的曲线贸易,并继续保持着与上海孤岛以及华北重要通商口岸的联系。香港成为了中国、英美等国对日本进行经贸较量的重要场所,它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时期里,有助于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104]

其三,香港在中国抗战经济中的作用。这是新近得到关注并挖掘的课题,研究认为,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纷纷前来香港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抗战经济的一个中心。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05]

其四,香港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援。有关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内地人士或机构利用香港从事救亡运动,比如宋庆龄及保卫中国同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有关活动。二是香港民众对祖国抗战的支援,他们以持久不衰的热情捐资捐物,同时组织回乡服务团,直接献身抗战,表现出了共赴国难的深厚情谊。^[106]

(五) 二战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香港与中国内地

相关研究侧重于国民政府的某些涉港事务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战后国民政府的某些行动涉及香港政局,并由此对中英关系产生影响,近年来有些研究选择了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加以剖析,可以说为两地关系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关于战后初期中国军队过境香港,有学者指出,此为战后初期中英关系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件,牵涉面甚广。国民政府与英国就此事进行了交涉,虽然订立了中国军队过境香港的有关协议,但双方仍然摩擦不断。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既利用此举调兵北上,在内战棋盘上排兵布阵,又借机昭示对香港主权的伸张。港英政府则势处被动,疑虑重重,竭力避免影响帝国的殖民统

治。总的来说,数量庞大的中国军队过境殖民地,对港英政府是一种政治压力,对于香港民众则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力催化。^[107]此外,国民日报事件也是牵涉多方关系的问题。研究认为,抗战胜利后内地与香港之间展开了引渡匪港汉奸的谈判,广东当局借机启动在香港的肃奸工作。香港肃奸旨在彰显国家意志,强化国民政府对香港的政治影响,然而,肃奸人员卷入了利益纠葛,加之港英当局态度消极,引渡谈判波折不断。愈演愈烈的肃奸风波引发了港英政府的强烈不满,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封闭了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有关事件充分表明了国民政府介入涉港事务时港英当局所能容忍的政治底线。^[108]

关于中共和民主党派对香港的利用,有多项研究关注到这一局面的出现与香港独特的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二战以后港英当局为了显示其“民主风度”,在宣传上及某些群众运动上给予一定的自由,所以,相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南京、上海,香港称得上是一方自由的土地。^[109]还有的学者指出,抗战胜利后英国政府与南京政府关系中的矛盾使港英政府置身于中国的党派纷争之外,允许中国各党派在无损于香港法律和秩序的前提下各行其是。南京政府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港英当局驱逐中共和民主党派人士出境,港英当局都以不干涉中国内部党派斗争和只引渡刑事犯、不引渡政治犯为由加以拒绝。^[110]也有的学者指出了港英当局此种态度的另一面相及其变化,认为港英当局对中共的活动也进行监视和干扰,尤其是在国共两党在大陆之决战临近胜负分晓之际,港督开始强调中共执政后会给香港带来更大的难题,故须订立条例抑制中共对学校、工会等的颠覆性影响。因此,40年代末的香港虽曾为各方力量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但港英与各方力量间的微妙关系所造就的平衡状态只能维持一段短暂时期。^[111]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和民主党派在香港的具体活动,有关研究认为,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前期着重于在香港建立一个宣传基地,打破南京政府在华南地区的新闻封锁。后期则配合迎接全国解放,中共利用香港开拓贸易渠道,并护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由于民主党派云集香港,香港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民主运动的中心。^[112]

(六) 香港与内地贸易关系

由于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特殊地位,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是香港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除可见于香港经济、贸易的通史性著作中的有关论述外,尚有诸多专题论文关注于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香港与内地贸易之梳理。

关于晚清时代香港与内地的总体贸易关系,有学者认为,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而香港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成为了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通过分析内地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可以看出,香港的对外贸易形成了与国内其他通商口岸差异很大的贸易模式,主要体现于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正常贸易与走私贸易并行、特货贸易发达等方面。^[113]

关于20世纪上半叶的香港转口贸易,研究认为,此一时期香港的转口贸易无论是规模上还是进出口商品的种类上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堪称转口贸易发展的黄金期。作为一个以港口经济为发展模式的地带,香港的发展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周边地区有很强的依赖性,在香港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内地的优势地位依然明显,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香港对外贸易的国际化倾向愈益显现,为日后香港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14]

有些学者对于香港与内地的贸易进行了个案研究,有关晚清时期香港与闽台贸易关系,研究认为,此一时期香港对闽台地区的贸易发挥了重要的转口功能,但具体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的进出口商品则又各具特色。总体来看,香港是大宗洋货和华南土货北销闽台地区的集中输出地,同时也是闽台地区若干特色产品转口海外市场的中转港。^[115]有的学者注意到对港贸易对本地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以民国时期香港与广西贸易为例,有学者指出,广西与香港的贸易对广西市场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一些传统行业在洋货的冲击

下逐渐萎缩,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输入的各种较为先进的设备使传统社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推动了广西社会的近代化。^[116]

关于香港光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有关研究揭示出不同政局背景下的贸易关系的演变,视角颇为独特。有学者认为,抗日战争结束后,粤港两地贸易曾一度恢复并得到发展,但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国统区社会经济分崩离析,官僚资本垄断了广东对外贸易,粤港间走私活动猖獗达于失控,民间正常商贸不断萎缩而陷入困境,这一切预示着近代粤港贸易史行将终结。^[117]与此同时,与粤港贸易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与华北及东北广大解放区的贸易蓬勃展开。有研究指出,解放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趋于结束,香港工商界掀起寻求与解放区发展贸易的热潮。天津解放后,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应政策,港英当局亦支持开展与中共新政权的贸易。新型的津港贸易具有很大的互补互利性,既打破了国民党和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亦推动香港摆脱经济困境,继续扮演中外贸易转口港的角色。^[118]

四、香港本地史

(一) 香港政制史

专著方面,周建华的《香港政团发展与选举(1949—1997)》^⑩以英国对香港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模式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及香港的政制改革、政治选举为背景,阐述了香港各主要政治团体产生发展的原因、演变过程及影响,研究香港政治团体发展与选举的关系,探索香港政治团体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和政治团体发展的前景,以及政党政治发展的趋势。

专题性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国在香港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以及港英统治的基本特征。关于19世纪英国对香港的统治,研究认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相结合,是早期港英统治的基本特征,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备受压迫,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之前不加掩饰的种族歧视制度才有了逐渐变化的迹象。^[119]关于20世纪以后港英当局的统治,有关研究注意到其中的变与不变。有学者指出,太平洋战争以前,港英当局基本上沿用19世纪的老办法进行统治,最突出的表现是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二战结束到60年代是过渡期,港英当局曾经许诺给港人有限的政治权利,但欲行又止,实际上仍不愿意放弃传统的统治方式。而自1970年代以后英国的治港方针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采取若干社会改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淡化殖民统治的效果。^[120]

(二) 英占前之香港史

相关研究破除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一直刻意宣扬的香港是个无人荒岛的说法。有学者指出,最早提出“荒岛”之说的是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有些外国人喜欢重复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夸大英国人对香港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而一些中国人沿用此说,多数是因为不了解真相。^[121]有关的深入研究认为,鸦片战争以前,香港岛上有清朝正规军常川驻守,清朝的法律在香港岛具有充分效力,中国人民在岛上建立了许多大小村落,港岛实行与当时中国大陆相同的土地制度,居民的风俗习惯与闽粤沿海一带大致相同。九龙半岛在1860年以前不仅是广东海防要地,而且清政府在这里建有城寨,经济和文化均有较大的发展。^[122]

(三) 香港沦陷及日据时代史

关于香港对日作战中的战略战术问题,相关研究表明了在处理香港所面临的多种复杂关系时,英方既警惕中国政府,亦提防香港华人的种种戒惧,即使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亦概莫能外。有学者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在华及东南亚的军事侵略,美、英两国相继改变在远东的“中立”政策,开始关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中英双方曾经就共同防卫香港有过接触和商议,英方也曾主动派人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联系,探索与中共抗日游击队合作的可能性。但有关谈判迁延时日,未有结果。香港保卫战打响后,港英当局显示出愿与中方合作抗日的姿态,但戒虑和顾虑犹存,不允诺独立武装在港华人和不让中国军队分担港岛

防务,始终是港英当局与中方军事合作的底线。^[123]还有学者指出,英军未能与中国部队联合抗日,更不敢武装香港同胞,是战略性的失败。而从战术方面看,由于日军集中使用兵力,保持战役战术的突然性,中、下级军官主动利用战机,而英军方面则部署指挥不当,导致英军在香港战役中迅速失败。^[124]

关于日据时代日本在香港施行的野蛮殖民统治,“归乡”政策得到较多关注。有学者指出,日军虽然迫不及待地清除香港人口,但对不同的人口实行不同的政策。对于贫民阶层,占领当局竭力强迫他们返回家乡,对于有产阶级,则要求他们留在香港。^[125]还有学者指出,“归乡”运动是日占时期香港战略地位变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产物,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利益和战略意图。与通常难民运动的无序状态不同的是,归乡运动是占领当局主导和有效掌控下的人口转移,并有同乡会等团体的奉命参与和汪伪政权的配合演出,归乡政策对于归侨来说是掠夺性遣返,其实施过程中充满杀机,残酷性非普通难民流动可比。^[126]

关于港九独立大队的抗日活动,《港九独立大队史》^②记述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动员群众、组织队伍杀敌锄奸的英雄事迹,以及在抢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抢运武器物资等方面的贡献。

(四) 香港经济史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香港所创造的经济腾飞奇迹,是香港问题得到举世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学术界有关香港经济史的研究,在呈现香港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的同时,力求对非常规发展的“香港经济现象”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全面、深入的总体考察,摸索、探究其发展的脉络、内在规律以及促成香港经济奇迹的多方面因素。

综合性专著方面,比较重要的有张晓辉的《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③,该书论述1840—1949年的香港经济史,内容极为广泛,涵盖近代香港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立法及相关政策、货币金融制度、财政税收、国际贸易、交通运输、通讯设施、城市基础建设、城市商业、制造业、农渔业、企业经营管理、劳动就业及工资、市场状况、人口及工商团体活动等方方面面,尝试对香港近代经济史进行综合性的探讨。

刘蜀永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经济》^④是内地学者与港澳学者分工协作的学术著作。该书比较深入地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香港对外贸易、航运、工业、商业、金融及财政的状况,并单独撰述了日占时期的香港经济。该书力求尽可能多地展示20世纪香港经济主要方面的变化的基本史实,并尝试对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影响经济兴衰的主要因素加以初步的学术探究。

在专题性研究方面,以下内容得到较多关注:

第一,香港经济史分期。关于香港二战以后的工业化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学术界看法大体一致,关于开埠后百余年的转口港时代的阶段划分,有学者提出以1841—1870年、1870年到一战结束、1920年到1950年的三个阶段分期法,其独特之处在于并非以香港历史的重大事件作为经济分期的界标,而是注重于香港转口港地位的升降轨迹,是一种较有特色的分期方法。^[127]

第二,香港英资财团。相关研究大致有两个最基本的研究视角,一是分析其在英国对华侵略中的作用,另一个是论述其对香港政治、经济的重要影响。冯邦彦的《香港的英资财团(1841—1996)》^⑤,系首次对香港英资财团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中文著作,填补了香港经济史研究中的空白。书中收集了大量的中文资料,惜较少引用英文书籍和档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关于汇丰银行,有学者指出了其成立初期在英国对华经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香港政府曾给予汇丰以各式各样的优待和庇护,与汇丰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128]关于怡和洋行,有学者认为,怡和早年在华经济活动是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一个缩影,1950年以后怡和则在香港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29]还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怡和的“百年昌盛”在政治上对香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之后则由于决策失误导致了江河日下的局面。^[130]

第三,香港华商史。对于长期被忽略的华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这一基本史实加以翔实阐释,是相关研究

的最大成就所在。张晓辉的专著《香港华商史》^[24]采用漫谈的方式介绍早期华商史,内容涉及香港华商的起源、华商涉足各行业的情况、华商的经营管理、华商社团、华商与爱国运动、华商的国际联系等方面。冯邦彦的《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25]对香港华资财团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资料十分丰富。关于香港开埠后华商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研究认为,大抵以19世纪70年代后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时期以行商南北行、金山庄的兴起为香港华人经济实力增强的突出标志,后一阶段则华人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业主,改变了华商与洋商的财力对比。与此同时,新的行业大量出现,专业化经营的趋向日益明显。香港华商积聚财富后,主要采取附股洋行与自办企业两种形式进行再投资,活动地域远及中国大陆和南洋等地,投资领域初时集中于与转口贸易相关的航运、金融、保险和食品加工等业,后来则拓展至工矿、电讯事业,近代工业则起步较晚,华商对制造业的投资兴趣不浓。^[131]另有学者指出,19世纪后半叶,香港华人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其主要社会基础是以洋行买办和转口贸易行商为代表的新式商人,他们除热衷于地产业、当押业、高利贷业等传统投资项目外,也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但从整体上讲,华商资本行业还不够齐全,经营管理手段比较落后,独立性还较弱。^[132]

第四,香港近代工业的发展。研究指出,香港华商经营工业起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出现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工厂,近代华资工业的发展特点是大起大落,一战时期、抗战初期及1939年欧战爆发均令华资工业获得发展良机,而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则造成华资工业史上惨败之一页。^[133]关于抗战初期香港华资工业的发展,80年代即有学者提出了“初期工业化”这一概念,认为香港从抗战爆发到沦陷之前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工业化历史,这对于二战后香港工业的重建和腾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6]其后的有关研究极大地佐证了上述论点,有学者认为,此一时期,华资工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原有华资工业进入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华资工厂数量迅速增加、工业门类趋于齐全、华资工厂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相当提高等方面,而促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则是联邦特惠制的实行、销场的全面扩大以及国内工业企业大规模向香港转移。^[134]

第五,鸦片问题。关于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有学者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继续扩大鸦片贸易,将香港变成输华鸦片的转运中心和走私基地,同时,为了增加岁入,特许香港政府实行鸦片专卖、自由吸食的政策,其鸦片专卖历经招商承办(1844—1913)和政府自营(1914—1941)两个阶段,1912年英国政府签署《海牙国际鸦片协定》后,港英当局并未认真考虑履行上述国际义务,而是决定从1914年起由政府取代之前的包税商,直接从事烟膏的垄断经营。港英当局常以无法禁止中国烟土入境为由,为自己实行鸦片政策辩护,实际上,无论是历任港督还是英国殖民地部官员都以确保香港岁入为要务,支持鸦片专卖政策。^[135]

(五) 香港社会文化史

综合性论著有张丽的《20世纪香港社会与文化》^[27],该书依循香港从移民社会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华人社会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两条基本线索,全面、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香港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历程,着重阐述了香港人口、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习俗风尚、社会组织、文化事业的变迁轨迹,并尝试揭示不同历史时期中社会及文化发展的特色及成因。

香港社会文化史方面的专题性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变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文化特性等方面。有关研究在梳理香港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史实的同时,均关注到香港独特的社会背景之下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有关早期华人生活状况的研究,既指出了工人阶级所受到了严重的种族歧视,^[136]亦指出了华人移民在香港得到了优于内地的生活,^[137]还有的学者着重研究了香港华人社会在香港早期城市发展进程中所做的调适,认为此种调适不仅为自己争取到在异国殖民统治下生存发展的空间,而且还为促进香港都市的繁荣、推动祖国的政治革新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138]关于香港早期的人口状况,有关研究对于香港地区人口增长、人口构成和流动人口等基本问题,均有较为细致的梳理。^[139]有的学者对20世纪上半期的人口状况详加分析,认为,香港人口的特点是移民构成了香港人口的主体,与此相匹配,其人口自然构成的各项

指标均表现出与定居人口明显不同的特征,在人口的社会构成方面,则明显反映出华人在社会等级阶梯上的劣势地位。^[140]

关于近代香港的社会问题,有研究指出,确保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建立和健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港英政府始终不渝的政策目标。前者形成凌驾社会的政治强制,后者形成“调节”民生的市场力量,两者并行不悖。近代香港的社会结构、社会风貌和世道人心,无不受此影响或制约。从根本上说,香港的种种社会问题或社会弊端,如种族歧视、官场腐败、贫富分化、毒赌黄三害等等,或与港英殖民统治共生,或以港英殖民制度为温床,具有常见、多发和难以根治的特征。^[141]

关于香港文化,有学者分析了20世纪上半期香港文化发展状况,认为,香港具有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作用,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曾经历过跳跃式的文化发展,但是,全新的文化事业在香港的发展相当迟缓,真正根植于香港社会的本地文化始终是举步维艰,同时,香港文化中封建、保守、低俗的特性相当突出。^[142]

还有的学者专门关注了抗战期间香港的中文刊物,认为,抗日战争开始至香港沦陷前,各派政治力量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开展对外宣传,克服了新闻检查、出版发行等困难,创办了多种刊物,使香港成为战时的一个重要的出版中心和文化中心。^[143]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年,尤其是近30年来的香港研究,可以说,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以及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促使大陆的史学工作者开始更多关注香港史研究之时,内地既有的研究成果不多,然而,如果从国际视野观察,西方人(主要是英国人)很早就开始研究香港史,并撰写了诸多有关著作。他们的著作虽然资料丰富,但往往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殖民主义偏见,其中较为典型的立论有,将英占以前的香港称为不毛之地、在撰述香港历史时以港督为中心构建香港历史体系,对于香港社会的主体——华人社会视而不见,抹煞华人对香港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而今,历经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大陆史学界创立了基于民族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体系,在充分借鉴西方学者和香港本地学者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对于香港史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以通史、专史、专题论文等多种形式,呈现了较为客观和全面的香港历史,实现了香港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和进展。

注 释

①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

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④香港中流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⑤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⑥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联合出版。

⑧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⑨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⑩China Quarterly,第151期。

⑪均为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⑫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⑬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⑭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⑯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7年。⑰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⑲香港迷思达蕾科艺公司,2003年出版。

⑳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 ②香港三联书店 2004 年出版。
 ③香港三联书店 1996 年出版。
 ④明报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⑤香港三联书店 1997 年出版。
 ⑥金应熙. 香港史话, “初期工业化”一节。
 ⑦新加坡名创国际出版集团 2005 年出版。

参考文献

- [1][18][22][58]刘存宽. 香港史著作中有关英国强租新界的几个问题[J]. 香港史论丛, 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 1998: 129, 121, 128, 133.
 [2][7]丁名楠. 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J]. 近代史研究, 1983(01).
 [3][14]陈胜彝. 香港地区被迫“割让”与“租借”的历史真象(上)[J]. 学术研究, 1983(02).
 [4]胡思庸, 郑永福. 《川鼻草约》考略[N]. 光明日报, 1983-02-02, 另外, 吕良海选编之《琦善与义律谈判纪略》(《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充分肯定了胡、郑论点的正确性。[5]刘存宽. 英国强占香港与所谓“穿鼻草约”[J]. 世界史研究, 1997(02).
 [6][9][12]陈胜彝. 香港地区被迫“割让”与“租借”的历史真象(下)[J]. 学术研究, 1983(03).
 [8][10]刘存宽. 英国夺取香港地区的开端——割占香港岛[J]. 文史精萃, 1997(04).
 [11][13]刘存宽. 英国夺取香港地区的继续——割占九龙[J]. 文史精萃, 1997(05).
 [15][16][20][23]张俊义. 英国强租和接管九龙新界的历史经过[J]. 近代史研究, 1989(06).
 [17]刘存宽. 英国夺取香港地区的完成——强租新界[J]. 文史精萃, 1997(06).
 [19]丁又. 香港初期史话[J]. 68; 元邦建. 香港史略[J]. 69;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1985: 262.
 [21]刘存宽. 评骆克《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J]. 广东社会科学, 2008(02).
 [24][26][30][31][34]李世安. 1943 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J]. 历史研究, 1993(05).
 [25][27][32]刘存宽. 1942 年关于香港新界的中英交涉[J]. 抗日战争研究, 1991(01).
 [28][37][40]陶文钊.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J]. 历史研究, 1994(05).
 [29]刘存宽, 刘蜀永. 1949 年以前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尝试[J]. 历史研究, 1997(03).
 [33][38][42]刘存宽. 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J]. 抗日战争研究, 1992(02).
 [35][43][45]冯仲平. 论战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1945-1949)[J]. 世界历史, 1993(04).
 [36]高岱. 战后香港归属之争述论[N].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4(02).
 [39]李世安. 1943 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J]. 历史研究, 1993(05).
 [41][48]于群, 程舒伟. 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J]. 历史研究, 1997(03).
 [44][46][47]刘蜀永. 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及中国的态度(1948-1952)[J]. 中国社会科学, 1995(02).
 [49]刘蜀永. 1949 年前后英国对港政策[J]. 20 世纪的香港, 195.
 [50]刘存宽. 19 世纪下半叶的九龙中国海关及其有关交涉[J]. 近代史研究, 1988(06).
 [51]邓开颂, 陆晓敏. 九龙海关的设立与赫德[J]. 广东社会科学, 1991(04).
 [52][54][56]张俊义. 近代中国海关的反走私努力与 1948 年中英关于香港《关务协定》的签订[J].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 年卷),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387, 398, 388.
 [53]冯琳. 中英关于香港关务协定及金融协定谈判中几个问题之考察[J]. 广东社会科学, 2007(04).
 [55][57]孙扬. 尴尬的外交成果: 1948 年香港关务协定实施之困境论析[N]. 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03).
 [59][60][62][66]刘蜀永. 九龙城问题始末[J]. 近代史研究, 1994(06).
 [61]郭家宏. 九龙城寨与中英关系[J]. 民国档案, 1997(02).
 [63][64][80]余绳武, 刘蜀永主编. 20 世纪的香港[J]. 231-234, 236, 67-68.
 [65][68][69]孙扬. 大国梦幻中的弱势外交——1948 年中英九龙城寨事件交涉析论[J]. 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01).
 [67]刘会欣. 宋子文与九龙城寨事件[J]. 史学月刊, 2009(01).
 [70]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87.
 [71]徐日彪.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和《联合声明》的签署[J]. 20 世纪的香港, 256.
 [72]刘蜀永主编. 简明香港史(1998 年版), 第 326.
 [73]徐日彪.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和《联合声明》的签署[J]. 20 世纪的香港, 267.
 [74]刘蜀永. 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J]. 史学集刊, 1991(02).
 [75][79]尚明轩. 孙中山与香港的密切关系[J]. 民国档案, 1997(02).
 [76][78]刘蜀永. 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J].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辛亥革命在各地: 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77]陈华新. 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香港[J]. 广东社会科学, 1986(04).
 [81]吴伦霓霞, 莫世祥. 粤港商人与民初革命运动[J]. 近代史研究, 1993(05).
 [82][84]金应熙. 关于 1922 年香港海员罢工的几个问题[J]. 学术研究, 1962(03).

- [83][90][91]张俊义. 20 年代初期的香港与广东政局[J]. 20 世纪的香港 ,87 ,88 ,100.
- [85]章洪. 香港海员大罢工[J]. 74 - 75.
- [86]刘丽.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J]. 近代史研究 ,1986(02) .
- [87][89]莫世祥. 也谈国共两党和香港海员大罢工——兼正马林报告中的不实之词[J]. 近代史研究 ,1987(05) .
- [88]襍倩红 ,卢权.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吗? [J]. 近代史研究 ,1987(05) .
- [92][96]蔡洛 ,卢权. 省港大罢工[J]. 155 ,143.
- [93][94][98]张俊义. 省港大罢工[J]. 20 世纪的香港 ,111 ,114 ,119.
- [95][97]牛大勇. 英国的两手政策与省港罢工之收束[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02) .
- [99]李晓勇. 国民党与省港大罢工[J]. 近代史研究 ,1987(04) .
- [100]张晓辉. 略论香港调停省港大罢工[J]. 史学集刊 ,1999(03) .
- [101][102][106]张丽. 抗日战争时期的香港与中国内地[J]. 20 世纪的香港 ,136 ,129 ,145 - 150.
- [103]张晓辉. 抗战前期的粤港贸易线[J]. 广东社会科学 ,1995(05) .
- [104]张晓辉. 论广州沦陷后香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 11 - 1941. 12) [J]. 抗日战争研究 ,2003(01) .
- [105]张晓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1937 - 1941) [J]. 抗日战争研究 ,2009(02) .
- [107]孙扬. 战后初期中国军队过境香港史实疏证[J]. 民国档案 ,2008(04) .
- [108]孙扬. “殖民地”的尺度: 香港肃奸风波与“国民日报事件”论析[J]. 近代史研究 ,2012(06) .
- [109][112]张丽.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J]. 20 世纪的香港 ,167 ,166 - 170.
- [110]朱宗玉等. 从香港割让到女王访华[J]. 1990 年福州出版: 175.
- [111]叶汉明. 从“中间派”到“民主党派”: 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1946 - 1949) [J]. 近代史研究 ,2003(06) .
- [113]毛立坤. 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1869 - 1904) [J]. 安徽史学 ,2005(05) .
- [114]张俊义. 转口贸易的黄金期——1900 - 1941 年香港转口贸易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 年卷)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3: 325 - 326.
- [115]毛立坤 ,张金革. 晚清时期香港与闽台地区的贸易关系[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8(03) .
- [116]周建明. 民国时期广西与香港的贸易[J]. 广西社会科学 ,2012(12) .
- [117]张晓辉. 略论抗战后的粤港贸易关系(1945. 9 - 1949. 10) [N].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2 卷第 2 期) ,2000 - 03.
- [118]张晓辉 ,崔占龙.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津港贸易及其历史地位[J]. 广东社会科学 ,2005(06) .
- [119][122]余绳武 ,刘存宽主编. 19 世纪的香港[J]. 235 ,13 ,17.
- [120]余绳武. 20 世纪的香港政制[J]. 20 世纪的香港: 9.
- [121]刘蜀永. 刘蜀永香港史文集[M]. 香港三联书店 ,2010: 64.
- [123]莫世祥. 盟友和对手——香港对日作战中的中英关系[J]. 近代史研究 ,1996(04) .
- [124]马鼎盛. 香港战役 18 天[J]. 广东社会科学 ,1985(03) .
- [125]刘蜀永主编. 简明香港史(新版) [M]: 276.
- [126]李光和. 抗战时期日占香港的“归乡”运动述评[J]. 民国档案 ,2010(02) .
- [127]金应熙 ,刘泽生. 试论香港经济的历史过程[J]. 广东社会科学 ,1985(01) .
- [128]汪敬虞. 汇丰银行的成立及其在中国的初期活动[J].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 5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275 - 297.
- [129]陈宁生 ,张学仁. 香港与怡和洋行——历史的回顾及有关怡和洋行译文两种[M].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 19 ,34.
- [130]金应熙 ,施汉荣. 别了 ,殖民主义时代——论香港怡和财团的兴衰及其启示[J]. 广东社会科学 ,1984(01) .
- [131]徐曰彪. 近代香港华商的崛起(1841 - 1900 年)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3(03) .
- [132]张晓辉. 从香港华商的兴起看海内外华人经济的交融(1840 - 1949) [J]. 近代史研究 ,1997(06) .
- [133]张晓辉. 近代香港的华资工业[J]. 近代史研究 ,1996(01) .
- [134]张丽. 1937 - 1941 年香港华资工业的发展[J]. 近代史研究 ,1999(01) .
- [135]石楠. 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1844 - 1941) [J]. 近代史研究 ,1992(06) .
- [136]徐曰彪. 早期香港工人阶级状况[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93(04) .
- [137]张丽. 20 世纪早期香港华人的职业构成及生活状况[J].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 年卷)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1.
- [138]莫世祥. 香港早期城市发展与华人社会的调适[J]. 近代史研究 ,1996(02) .
- [139]徐曰彪. 近代香港人口试析(1841 - 1941) [J]. 近代史研究 ,1993(03) .
- [140]张丽. 20 世纪上半期香港人口研究(1901 - 1941 年) [J].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 年卷)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4.
- [141]徐曰彪. 近代香港的社会问题[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8(01) .
- [142]张丽. 20 世纪上半期香港文化发展简论[J].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02.
- [143]黄增章. 抗战期间香港的中文刊物[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03) .

(责任编辑: 贺永泉)